

促進漢藏的對話與相互瞭解

黃默

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

上書：西藏人與中共的另類對話

台北雪域出版社，2012年

第十世班禪喇嘛等

達賴喇嘛與華人對談錄

台北雪域出版社，2013年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等

台灣公民社會對西藏的關懷是這幾年的事情。台北雪域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有關西藏的書籍，對瞭解西藏的情況十分有幫助。我評論的這兩本書都是雪域出版社出版的：《上書：西藏人與中共的另類對話》出版於2012年，收集了這幾十年來西藏人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上書，表達對西藏情況的看法，也懇求中國共產黨中央能給予西藏較大的關懷，修訂對西藏的政策；另外一本書是《達賴喇嘛與華人對談錄》，收集了達賴喇嘛在公開場合的講話，尤其是與漢人知識份子的對談。我不可能對《上書》的每篇文章都做評論，但我認為書中兩篇文章值得大家閱讀並進一步去思考。一篇是第十世班禪喇嘛給中國共產黨撰寫的〈七萬言書〉，完成於1962年。閱讀〈七萬言書〉最初的一個印象是語氣非常的謙卑，對台灣的讀者而言，這是非常難以想像的。十世班禪喇嘛是西藏舊社會的宗教政治領導階層，但他的背景又十分的特殊。在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初，班禪喇嘛的地位並沒有得到西藏政府的認可，也可能基於這樣的一個原因，班禪喇嘛或是他的顧問在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初，立刻發出信件公開擁護與支持中國共產黨。這些書信在2011年茨仁夏加所著《龍在雪域》這本書有比較完整的報導，當年班禪喇嘛才十二歲（66-65）。

雖是如此，在短短幾年之間，班禪喇嘛便深切體會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統治與他的期待背道而馳。〈七萬言書〉中對西藏的情況、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政策，以及中國共產黨幹部在西藏的態度與作風，都有深刻的描述。班禪喇嘛談了八個問題，幾乎概括了西藏所有面對的難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平叛」（即平定叛亂），這指的是在五〇年代，中共面對西藏反抗——尤其在康區的武裝叛變——所採取的鎮壓。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民主改革。第三個問題是有關在西藏的農民、牧民，還有生產與人民生活的問題。第四個問題是有關統一戰線的問題，也是針對所謂愛國的、進步的中上階層人士，爭取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在不少章節，班禪喇嘛或多或少把自己歸納為愛國的中上階層。第五個問題是有關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共產黨怎麼樣把黨的政策與西藏實際的情況結合，以推動、完成在西藏的統治。第六個問題是有關專政。第七個問題有關宗教，十分明確地，這是班禪喇嘛最關心的一個議題，後文我還會進一步地說明。第八個問題是關於民族的地位，也就是漢藏關係，這也是班禪喇嘛另一個關切的問題。在〈七萬言書〉中，班禪喇嘛提的問題不限於當今的西藏自治區，也討論到鄰近的幾個省。他把這鄰近的四個省，即青海、甘肅、四川與雲南稱為兄弟省，分別都做了一些報導與評論。在他看來，這四個兄弟省的情況，比西藏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所帶來的傷害可能比西藏來的嚴重。

如我上面所說，班禪喇嘛對中國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十分恭維，沒有一句批評的話，這可能是基於信仰與立場，但也可能是為了表達他對現況的批判，不得以所採取的手段。但這裡有一個問題：既然班禪喇嘛不能或是不願意批評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他只能把他看到的、把他關懷的這些問題、把中國共產黨統治西藏所帶來的災害，都歸咎於幹部在執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策的時候，違背了黨的政策，不能與西藏實際的情況結合。然而這樣一個基本態度，是不是可能造成推論上的矛盾？比如說，在 1962 年的中國，包括西藏地區，都已經過了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運動。這些運動、政策在在表現出毛澤東冒進的思想，或者是毛澤東追求烏托邦的思想，已經給中國與西藏帶來不可言喻的傷害。班禪喇嘛只把這些政策、立場的錯誤，歸咎于漢人幹部，當然也包括一些藏人幹部在執行層面的失誤，這是不是一個客觀的評價？

我們再來看班禪喇嘛是怎麼描述當時西藏的情況，尤其是有關宗教生活，以及漢藏之間的關係。班禪喇嘛先肯定毛澤東與周恩來總理在 1959 年有關平叛與民主改革所做的大方針與政策，讚揚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動的承諾。但是事與願違，只過了幾年，西藏面臨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

在民主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依賴貧困的喇嘛實行「三反三算」（2012: 52-53）。為了破除迷信，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無所不用其極；甚而把「大藏經」當作施肥的原料，許多佛像與經書用於做鞋子的原料，同時又千方百計使僧尼還俗（2012: 55-56）。民主改革前，西藏大中小寺廟兩千五百餘座，政府留下來的只有七十多座，也就是減少了 97%。大部分的寺廟沒有人居住，大經堂、神廟、精舍也沒有人管理，造成非常大的破壞，大部分已經倒塌。又西藏過去僧侶與尼姑總數約有 11 萬人，其中外逃的可能有 1 萬多人（這裡指的應該是隨著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僧尼），剩下來的也有 10 萬多人。但是在民主改革結束以後，住在廟裡頭的只剩七千人，也就是減少了 93%，同時寺廟僧尼的素質也十分的低落，唯有札什倫布寺是例外。事實上，寺廟已經失去作為宗教組織的意義。尤其叫班禪喇嘛痛心的是，寺廟僧尼的作風不堪聞問，民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與委員，好些行為如姘、嫖、酗酒，完全把失戒不算是一回事，而且公開無忌地在寺內結戀婦女、蓄髮改裝等等。最後，在寺廟的任務方面，作為衡量有無顯宗傳授標準的「三根基」也廢去了，宗教的活動少之又少，而是把生產列為首要之務，大部分老少僧眾與善僧都被派去勞動，造成了過勞的情況（2012: 55-56）。

在有關民族的問題，即漢人與藏人關係的問題方面。班禪喇嘛對漢人幹部有不少批評，說他們深受大民族主義的影響，驕傲自滿、剛愎自用、蔑視藏族、侵犯藏族的權利，甚而把主張藏人權利與利益的人扣上地方民族主義的帽子。具體來說，「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公文只用漢文起草，而不用藏文，但是正副主任與委員中的藏族成員大多數不懂得漢文，因而只是把我們需要看的文件譯成藏文，具有法律性的決議與佈告等等，只求在漢文上搞好了，藏文只能理解意思就行了。」與此同時，在各級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幹部如果不穿漢裝就

受到嘲弄與歧視，對婦女的首飾、男人的辮子，也表現出討厭的態度，對屋子牆外的粉刷、屋頂上的旗杆、婚喪送禮、朝會敬神、節日的娛樂與民間體育活動，也都被看為是無益的、多餘的，也都被停頓了下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討論自治權，當然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2012: 68-69）。

我們可以想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七萬言書〉是必然受到批評的，班禪喇嘛也因此受到批鬥，在監獄裡度過了九年十個月的歲月。鄧小平執政以後，班禪喇嘛獲得平反，也恢復了他的職位。在1980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台上，鄧小平對十世班禪喇嘛說：「你是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你的七萬言書是正確的，部分是錯誤的，對你的處理是重了。」班禪喇嘛過世於1989年。

另外一位上書的藏人，名字叫做平措汪傑，是一位非常具有傳奇性的人物。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年輕的時候，便在西藏康區創立了西藏共產黨，那是1939年的事情。那時候他只有十七歲，便與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印度共產黨建立聯繫，也得到這些共產黨組織的支持。1943年，他在拉薩，成立「全體西藏民族統一解放聯盟」；1946年，以「西藏東部人民自治聯盟」的名義，在金沙江以東，即國民黨所控制的西藏康區，發起武裝暴動，試圖以武力達成西藏民族的自由與統一。1950年年初，他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取得聯繫，得到朱德的來電，叫他到重慶與西南軍政委員會見面。1950年五月，鄧小平在親自起草的西南局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電報，報告了平措汪傑與他見面的情況。從此以後，平措汪傑就參加了西藏工作委員會。然而在文革時，平措受到了批鬥，並在北京秦城一號的監獄，度過二十年的時光，迄今並沒有任何對他證實的控告罪名。1979年他終於得到釋放，並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1980年他上書中國共產黨中央，要求落實自治的權利。2004年以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給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等上書，提出對西藏問題解決的方案。從這幾封上書來看，平措最關心的是自治的問題。然而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他又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看法，那就是他對達賴喇嘛十分的尊崇，並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與達賴喇嘛應該就西藏的問題取得協議。他把達賴喇嘛看做是解決西藏問題不可或缺的條件。在2004年給胡錦濤總書記的信裡說：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為人，他的政治聲望與影響力，可以說超過了歷代的達

賴喇嘛，人們稱讚他是當今活的佛陀，是世界性的宗教領袖之一，受到世人的尊敬與崇拜（2012: 352）。他也提到達賴喇嘛兩次訪問台灣，台灣的各政治黨派、教派、各界人士傾城而出，來迎接他、朝拜他。再進一步來看，他強調達賴喇嘛已經放棄了政治，專事佛教，因此政教合一的舊體制已經宣告結束了。他說：中央與達賴喇嘛雙方的基本觀念根本不存在任何實質的分歧，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解決不了的難題與障礙。中央強調要國家統一，達賴喇嘛只是要求真正的民主制度，符合憲法與自治法的基本精神（2012: 343–344）。我們不難想像，這樣的立場在八〇年代或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二〇年代都不可能得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的接納，他的上書也從來沒有得到什麼回應。另外，他的上書也一再提到他與漢人幹部的衝突，受到漢人幹部的攻擊，被視為地方民族主義者，受盡迫害。這情況看來是多民族的帝國都面對的問題，也就是中央政府怎麼對待少數民族幹部的問題。即使是自稱為共產主義的政府，也不能擺脫這樣的困境。中國是這樣，在解體之前蘇聯聯邦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將十世班禪喇嘛與平措的立場與言論作一個初步的比較，他們兩個人的背景可說是南轅北轍：十世班禪喇嘛是西藏舊社會的統治階層，而平措是西藏最早創立共產黨的共產黨人，把自己看做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他們對西藏現況的評價卻有相似之處。他們兩個人都非常關懷宗教與民族的問題，也都批評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統治是一步一步、徹底地把西藏同化了，是一種漢化的政策。又如上面所說到的，平措又對達賴喇嘛非常的尊崇，一再建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應該與他溝通，共同來解決西藏的問題。

《達賴喇嘛與華人對談錄》（以下簡稱《對談錄》）中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95年在波士頓對中國學生的講話。達賴喇嘛在這篇文章中提到，經過天安門悲劇以後，大批的中國知識份子與學生逃離了中國，也提供了境外的西藏人與中國人一個相互瞭解和交流的時機。他一再強調，他不是中國政府所說的企圖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分裂主義分子。他說：我做的這一些事情，只不過是為了保護西藏的文化以及獨特的民族傳統，尋求一個藏人與漢人兩方面都能接受，並對兩方面都有幫助的、有益的、公平的解決問題的方案（2013: 26）。在2008年西藏抗暴以後，達賴喇嘛進一步認為，與華人知識份子的對話是解

決西藏問題必經的道路。2010年10月，在加拿大多倫多，達賴喇嘛對加拿大華人的談話中說：大約在三、四十年前，我就向藏人說，一定要與華人會面，一定要與華人結交。但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前，很少有華人向我們伸出援手和作出回應；而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向我們作出回應的華人逐漸的增多。2008年西藏事件爆發以後，我遇到很多來自中國境內的學者。他們有的說，在2008年以前他們根本不關注西藏，到了2008年以後才開始關注、了解西藏（2013: 36）。他也為他主張的中間路線辯護。在2009年8月6日，日內瓦漢藏交流大會上，他說：「我們流亡印度不久，就開始深思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向，而且獲得了初步的共識：唯有與中國當局接觸才可能解決問題。因此，1974年就擬定漢藏互惠的中間道路政策。197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談建議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後十五年，我們派遣代表團先後進行了二十多次的參觀和協商，然而都沒有取得實質的進展。因此在流亡社會當中，我的中間道路面臨越來越多的批判與挑戰。在1997年對這樣的公共議題，我們進行了公投，結果64%的民眾支持中間道路政策。根據民意，我們再度努力尋求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對話的機會，從2002年到2008年，我的代表與中共的相關人員進行了八輪正式會談，以及一輪非正式的會晤。不幸的是，因為中國領導人缺乏以實際行動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所以這些會談沒有取得任何具體的成果（2013: 95-96）。」

達賴喇嘛與漢人的對談中，這些年來最引人入勝的應該是2010年5月，由王力雄主導，透過Twitter邀請達賴喇嘛回答中國網友評選的問題。這可說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會談。會談從5月17日早上開始，中文的網友透過google對話，經過為期四日的交談，共有1,253人提交了289個問題，並經過投票，投了12,473票對問題進行評論。從這一些評論中，王力雄再選出支持度最高的問題來請教達賴喇嘛（2013: 110）。根據支持度的順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網友最關心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對西藏以後宗教領袖的問題，也就是說，在達賴喇嘛過世以後，是不是可能出現類似當前兩個第十一代班禪？達賴喇嘛的回答是這樣的，他說：「在1969年我對外有個非常正式的宣佈，就是未來是不是繼續達賴喇嘛的體制，應該訴諸西藏的人民，並取決於西藏人民的決定。同

樣在 1992 年，我又做了一個正式的宣示，未來西藏問題解決以後，我將不會擔任西藏政府的任何職務；西藏的一切事務由西藏境內留任的公務員繼續的管理。2001 年，西藏流亡組織的行政首長開始在西藏流亡社會透過民選的方式產生，任期為五年。因此我覺得達賴喇嘛這個體制並不重要，健在的時候我會努力；對達賴喇嘛體制，中國共產黨比我還要關心，所以是有可能出現兩個班禪的現象，但這除了增加混亂，不會有正面的幫助（2013: 113）。」

支持度第二的問題是「想向尊者瞭解一下關於流亡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的情況，為什麼每次都無果而終？到底雙方在哪些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以致談了幾十年仍然沒有成果？」達賴喇嘛的回答是：「主要是中國官方一再強調沒有西藏的問題，只有達賴喇嘛的問題，但是我個人並沒有任何的訴求。我主要關心的是 600 萬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與環境的問題。直到中國共產黨中央能體認到有西藏問題，如新疆問題一樣，並努力去解決，才可能有辦法」；他說：「我們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目標是一致的，是為了西藏的建設、發展與團結，但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做法只是透過強制的手段，一再強調西藏的穩定，而在我看來，穩定應該是來自內心的信任與信賴（2013: 155）。」

時隔兩個月，達賴喇嘛再次與中國網友以 Twitter 對話。這次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達賴喇嘛過世以後，「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是不是可能展開大規模的恐怖活動？請問達賴喇嘛有何對策？達賴喇嘛的回答是：「藏青會確實對他的政策有所批評，同時，尋求西藏完全獨立的呼聲有所擴大。但是藏青會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我們對漢藏互利所做的努力，沒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們的意見越趨尖銳。然而總體來說，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信賴非暴力的和平路線，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擔心（2013: 125）。」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大藏區與現有中國省份行政區的重疊如何解決的問題，重疊區域的其他民族是不是由「大藏區自治政府」來管理？他們的意願如何得到保障？達賴喇嘛的回答是：「我們從來沒有提過大西藏這一個名詞，這是中共統戰部強加於我們的，我們的訴求是語言文字同軌的人要有保護、發揚宗教文化的平等權利，與經濟發展的平等權利。我們的訴求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中尋找出路（2013: 125-126）。」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與達賴喇嘛的《對談錄》，是為了進一步幫助讀者們瞭解中國共產黨統治西藏的真相、藏人的訴求與華人知識份子——尤其是生活在中國境內的知識份子——對今後西藏可能發展的擔憂。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試圖尋找一個比較超越政治的、在文化上的共識，但都沒能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同意。我們可以想像在達賴喇嘛過世以後，在海外、在歐美受教育的年輕一代，可能轉向比較激烈的獨立訴求。從這個角度來看，西藏的情況、漢藏的關係，並不是那麼樂觀的，武力的抗爭並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漢藏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必然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也應該是大多數漢人與藏人不願看到的局面。

漢藏對話、漢藏相互瞭解，沒有遲疑的是一件十分艱鉅的工程，但這也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在台灣的華人社會，尤其是華人知識份子，應該盡其所能地來參與並擴大漢藏的對話與相互瞭解，進而給中國政府壓力，促使北京開始反思這幾十年來統治西藏的立場與政策，並作出適當的回應。與此同時，華人知識份子也應該協助藏人在國際社會發聲，爭取同情與支持。